

## 劳伦斯与锡安主义\*

(英) 塞西尔·布鲁姆 著\*\* 赵娜 译\*\*\*

**内容提要**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陆军军官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T. E. Lawrence)与阿拉伯人共同抗敌,并参加反抗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大起义,其间,他从生活习俗上完全融入了阿拉伯社会,被称作“阿拉伯的劳伦斯”。历史学家们对劳伦斯的立场有不同的解读。本文通过分析书信、会议记录、传记等相关资料,探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锡安主义活动的类型和阿拉伯人对此的反应,以此重新审视劳伦斯在阿拉伯与犹太锡安主义(的关系)中的立场。笔者认为劳伦斯鼓励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肯定了犹太移民对巴勒斯坦地区经济和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同时,劳伦斯致力促成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的和谈,支持二者在巴勒斯坦共处,是亲锡安主义者。

**关键词** 劳伦斯 阿拉伯人 锡安主义 阿以冲突

“他(劳伦斯)与锡安主义运动<sup>①</sup>的关系是非常积极和正面的,即使他的确与阿拉伯人非常友善,也曾被误认为是反锡安主义者。他的观点是……犹太人可以为阿拉伯人提供巨大的帮助,阿拉伯世界一定会从犹太人在巴勒

---

\* 本文原发表于 Cecil Bloom, “T. E. Lawrence and Zionism,” in *Jewish Historical Studies*, Vol. 38, 2002, pp. 125 - 145。

\*\* (英) 塞西尔·布鲁姆(Cecil Bloom), 主要研究犹太现代史。

\*\*\* 赵娜,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

① 锡安主义(Zionism), 基于犹太人从宗教上和传统上与巴勒斯坦土地的联系, 国际犹太人组织寻求重回巴勒斯坦, 建立“犹太家园”的运动, 又称犹太复国运动。——译者注

斯坦的国家中获利。”<sup>①</sup> 依照这段时期<sup>②</sup>的历史，锡安主义领袖、以色列第一任总统哈伊姆·魏茨曼（Chaim Azriel Weizmann）认为劳伦斯（即众所周知的“阿拉伯的劳伦斯”）在阿拉伯与锡安主义关系中的立场具有合理性。本文的目的是为这一论点提供支持。

## 一 劳伦斯在阿拉伯国家的经历

在他所谓的阿拉伯时期，劳伦斯迫切把自己认定为阿拉伯人的朋友。他经常穿着阿拉伯传统服饰，甚至曾经身着阿拉伯服饰出现在英国国王乔治五世面前，所以魏茨曼的话乍听起来会让人大吃一惊。但是有记录显示劳伦斯在很多场合都表示了他对锡安主义运动的同情和支持。他不时地拜访魏茨曼的官邸，两人都非常享受，用魏茨曼的话说，“这段长久的友谊”<sup>③</sup>。劳伦斯无疑是非常欣赏魏茨曼的，他曾经写信给耶路撒冷的英国圣公会主教说“魏茨曼是一个伟大的人，无论是您还是我，我亲爱的主教大人，都不配给他擦靴子。”<sup>④</sup> 这原本是对主教要求劳伦斯否认1919年他对魏茨曼发表的一个声明的回复，但他最终并未发出这封信，诸多著作都提及劳伦斯支持阿拉伯独立事业的事迹。二战期间，许多阿拉伯人认为劳伦斯是把他们从土耳其人那里解放出来、带给他们独立的人，而且把他与希特勒相提并论，认为他们都是令人钦佩的。<sup>⑤</sup> 然而，一些当代阿拉伯作家认为劳伦斯是“对巴勒斯坦有企图的锡安主义的支持者”。<sup>⑥</sup> 最近几年，一些著作立足反锡安主义的观点，反倒给劳伦斯安上了锡安主义支持者的标识。

① C. Weizmann, *Trial and Error*, London, 1949, pp. 294 - 295.

②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在麦加谢里夫侯赛因的领导下，反抗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统治，争取独立，建立阿拉伯民族国家。国际锡安主义者也借此游说西方国家，特别是当时最强大的殖民帝国英国，希望获得英国的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国家。一些犹太大家族手中掌握的强大资本成为游说和在巴勒斯坦定居的必要条件。——译者注

③ A. W. Lawrence ed., *Lawrence by His Friends*, London, 1937, p. 183.

④ D. Garnett ed., *The Letters of T. E. Lawrence*, London, 1938, p. 343.

⑤ H. M. Sachar, *Europe Leaves the Middle East, 1936 - 1945*, London, 1947, p. 159. 一战之前，德国威廉二世就开始在土耳其加紧渗透，特别是获得巴格达铁路的修建权，在土耳其君主和民众中，相比英法俄的传统殖民势力，从未在中东有过殖民历史的德国人更受欢迎。——译者注

⑥ U. F. Abd-Allah, *The Islamic Struggle in Syria*, Berkeley, 1983, p. 38.

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出生于1888年，在牛津大学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历史学学位后，主要从事考古工作。在1913~1914年，他参与了英国陆军军部对内盖夫沙漠(the Negev)和西奈山(Sinai)的勘测工作。1914年战争爆发后，他在英国陆军服役，被派往开罗的军事情报局任职。1916年，他被派往新成立于埃及开罗的阿拉伯办事处，该办事处的目的是利用阿拉伯人的抱负<sup>①</sup>帮助英国实现战争目的。几个月后，劳伦斯被任命为埃米尔费萨尔(Emir Feisal)的联络官。费萨尔是麦加谢里夫侯赛因(Hussein)的儿子，领导了阿拉伯反对土耳其的大起义。劳伦斯帮助指挥阿拉伯人的军事行动，并分别于1917年占领阿克巴(Aqaba)、1918年攻入大马士革。在巴黎和会上，作为费萨尔的高级顾问，劳伦斯在费萨尔的外交团队中的地位是独特而又充满权威的；毫无疑问，他对这位阿拉伯王子影响很大。在任期间，他负责起草费萨尔的声明和讲话的英文稿件。随后，作为英国殖民办公室的外交官，他参加了1921年的开罗会议。此次会议中，费萨尔被推举为伊拉克国王，他的弟弟阿卜杜拉(Abdullah)为外约旦的统治者。

英国政府对阿拉伯人的支持，不仅是在一战中击败土耳其人的手段，更希望能在中东获得更强大的据点。众所周知，劳伦斯在阿拉伯大起义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并非大众所认为的他指挥了阿拉伯军队。劳伦斯是费萨尔的军事和政治顾问，他为费萨尔服务的目的是影响他，以保证英国政策的落实。1917年之后，劳伦斯的主要活动服务英国在中东的利益。这一利益似乎曾经是建立新的阿拉伯国家，把阿拉伯人从土耳其人的统治中解放出来。劳伦斯对法国人怀有极大的敌意，而且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他的反法情绪。他大力反对英法签署的《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 Agreement)<sup>②</sup>中，法国在叙利亚的各种要求。除了一份关于叙利亚的情报报告，他还激烈抨击贝鲁特的亲法倾向，痛斥贝鲁特像个下水道，“陈腐的外国势力通过它流入叙利亚”。<sup>③</sup>战后他的目标之一是努力为犹太人资助费萨

① 受西方民族主义的影响，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人力求摆脱奥斯曼帝国土耳其人统治，建立独立的阿拉伯民族国家。麦加谢里夫侯赛因与英国驻埃及高级官员麦克马洪通信，希望借助英国的支持，建立君主制的阿拉伯国家。——译者注

② 1916年5月16日，经英国外交官M.赛克斯与法国外交官G.皮科谈判而秘密签署的协约，内容是瓜分奥斯曼帝国的亚洲部分。

③ L. James, *The Golden Warrior*, London, 1990, p. 96.

尔，甚至为所有的阿拉伯人<sup>①</sup>牵线搭桥。有人猜测，这种安排将有损法国在中东的地位。

1922年7月，劳伦斯突然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他化名为约翰·休姆·罗斯（John Hume Ross）加入了英国皇家空军，成为一名卑微的空军士兵。不巧的是，《每日邮报》的记者发现并披露了他的行踪，导致他被空军解雇。随后，他加入英国皇家坦克部队。两年后，（因为之前军队中一些朋友的运作）他得以重回皇家空军。这一次，劳伦斯化身名为T. E. 肖（T. E. Shaw）的机修工，直到在1935年的摩托车事故中遇难。我们很难评估他突然离开公共事务和他入伍的原因。由于（英国政府）对待阿拉伯人的方式<sup>②</sup>，他的幻想显然破灭了，随着他与阿拉伯人关系的淡化，他不断被绝望的情绪打击，但这仍无法充分解释他这些行为的动机。

时至今日，劳伦斯在阿拉伯大起义中的作用还是人们争论的话题。即便他本人，关于与阿拉伯人关系的说法也互相矛盾。有人指责他对阿拉伯人根本没有深厚的情感，认为他认可保持中东的分裂状态符合英国的利益；也有人认为他明知不可能，还故意欺骗阿拉伯人，使他们相信英国赞成他们摆脱土耳其统治后获得独立。<sup>③</sup> 这些评价并不公正。劳伦斯曾说自己一度因为英国未能兑现阿拉伯人的诺言而备受打击、倍觉羞辱。但是，在给自已的著作《智慧的七柱》（*The Seven Pillars of Wisdom*）的未删节版（并未出版）作序时，他表达了坚定的信念“英国从阿拉伯事务中清白地离开”，还补充道：虽然一些阿拉伯人不认可他的意见，但他曾经“真诚地支持过他们。他们认为我落伍了，而我很高兴离开这个从不会让人觉得惬意的政治环境”。<sup>④</sup> 然而，在《智慧的七柱》第一版的序言中，劳伦斯又暗示，虽然他希望帮助阿拉伯人追求独立，但他一直参与英国针对他们的阴谋。他写

① P. Knightley and C. Simpson, *The Secret Lives of Lawrence of Arabia*, London, 1969, pp. 4 - 5.

② 1915年，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麦克马洪作为英国政府的代言人在与侯赛因的通信中，虽用词模糊，但表示赞同阿拉伯人在帮助协约国打败奥斯曼帝国后，建立君主制的阿拉伯王国。1917年，英国外交大臣A. J. 贝尔福写信给锡安主义者领导，承诺支持其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称《贝尔福宣言》。1917年，俄国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政府公开了沙俄的秘密文件，其中披露的《赛克斯—皮科协议》将奥斯曼帝国亚洲部分地区划分为不同的、独立的行政区域，分属英法统治，与其对阿拉伯人的承诺完全冲突。——译者注

③ Knightley and C. Simpson, *The Secret Lives of Lawrence of Arabia*, London, 1969, p. 4, 53.

④ Esco Foundation, *Palestine, A Study of Jewish, Arab and British Policies I*, New Haven, Conn., 1947, p. 202.

道 “内阁明确承诺以支持阿拉伯人建立自治政府的条件使他们为我们而战……他们（阿拉伯人）把我看作英国政府的代理人，要求我担保英国政府做出书面保证。所以我不得不加入这个阴谋……他们渐渐习惯相信我，认为我的政府会像我一样真诚……我并不为我们一起所做的事情骄傲，反而不断地感到深深的羞耻。”<sup>①</sup> 他也曾写道他在阿拉伯的服役是在“卖身”<sup>②</sup>。我们必须做出结论：劳伦斯的确支持了很多阿拉伯人的理想，也试图寻求其与自己政府目标之间的平衡，而他内心的矛盾无疑使他最终离开了公众的视野。

## 二 劳伦斯对《贝尔福宣言》与锡安主义的认知

劳伦斯是个非常复杂的人物，他喜欢标新立异，古怪的标新立异，但他是个天才。温斯顿·丘吉尔认为他充分显示了“天才的多才多艺”，因为他“拥有打开各种宝库的万能钥匙”<sup>③</sup>；对劳合·乔治（Lloyd George）而言，他“难以捉摸、无法估计而且拥有一种神秘感”<sup>④</sup>，但也有对他不屑一顾的人。劳伦斯拥有文学天赋，他关于阿拉伯大起义的作品《智慧七柱》被公认为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作为反抗土耳其人统治的伟大的激励者，劳伦斯与阿拉伯的战士们并肩作战，做出了很多英勇的事迹。但奇怪的是，约旦阿卜杜拉国王却写道，1917年3月，当劳伦斯来指导他们如何破坏土耳其人的铁路时，阿拉伯军人普遍不喜欢他。<sup>⑤</sup> 然而，有记录显示这位国王也认识到劳伦斯为阿拉伯人所提供的巨大帮助。<sup>⑥</sup> 即便如此，在读了《智慧七柱》后，他仍称劳伦斯“撒谎，是个骗子”。<sup>⑦</sup>

劳伦斯慢慢相信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利益并不相互排斥，锡安主义

① T. E. Lawrence, *Oriental Assembly*, London, 1939, pp. 144 - 145. 劳伦斯的弟弟于1939年（劳伦斯去世4年后），发表了这篇序言。作者认为劳伦斯本不想发表这篇序言，而且据说是出于“政治原因”。——作者注

② Knightley and C. Simpson, *The Secret Lives of Lawrence of Arabia*, London, 1969, p. 156.

③ W. S. Churchill, *Great Contemporaries*, London, 1949, p. 193.

④ D. Lloyd-George, *Memoirs of the Peace Conference*, New Haven, Conn, 1939, p. 666.

⑤ P. P. Graves ed., *Memoirs of King Abdullah of Jordan*, London, 1950, p. 170.

⑥ P. P. Graves ed., *Memoirs of King Abdullah of Jordan*, London, 1950, p. 171.

⑦ *Jerusalem Post*, 7 February 1954.

和阿拉伯民族主义可以互补，也可以在中东共存。但是，对于《贝尔福宣言》( Balfour Declaration) <sup>①</sup>，他的心情是矛盾的，因为《贝尔福宣言》明确提出英国政府支持并会尽力帮助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但是随后，劳伦斯关于犹太人建国的观点改变了。1917年12月劳伦斯告诉中东占领区政治官、亲锡安主义（非犹太人）的理查德·迈纳茨哈根（R. Meinertzhagen），他认为巴勒斯坦已成为阿拉伯主权领导下的一个自治省。<sup>②</sup>但是在大约三个月之前他也曾写信给当时驻开罗的外交官马克·赛克斯，暗示他接受犹太国家的设想。劳伦斯在信中说，费萨尔已经同意不在（瓦迪峡谷）阿拉瓦省以西——“死海—约旦”沿线或者海法以南——北山沿线发动军事行动或进行煽动，他打算和讲阿拉伯语的“巴勒斯坦犹太人”合作。另外，劳伦斯想联络被他称作“殖民犹太人”的群体，看看他们得到了什么承诺。他还写道“现在费萨尔想知道殖民犹太人（有时称作锡安主义者）与协约国之间达成了怎样的约定。对于巴勒斯坦南部，重要的是对未来的协定，至于加利利就要看眼下怎么安排了。你们给锡安主义者承诺了什么？他们的计划又是什么？”他继续说“你知道我是非常支持英国，也支持阿拉伯的。法国在我这儿排第三。但是我也承认我们可能不得不卖掉小伙伴来付钱给大朋友，或者出卖我们未来在近东的安全来偿付我们当下在佛兰德斯（Flanders）的胜利。如果你愿意告诉我，我们必须给犹太人和法国人什么，我会尽我所能，让事情变得简单。费萨尔拥有一切成功人士的理智，是时候按照我们的意愿塑造他了。”<sup>③</sup>还有一点很有趣，虽然是不同时间说的，但劳伦斯告诉赛克斯任何传递给费萨尔的信息必须来自他本人，因为“我通常喜欢在他（费萨尔）之前做出决定。”

劳伦斯认为《贝尔福宣言》通过塑造一个受英国保护、由锡安主义者

① 《贝尔福宣言》：1917年11月2日，英国外交大臣 A. J. 贝尔福与锡安主义代表罗斯柴尔德的通信中，代表英国政府表示愿意支持并帮助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这一态度与英国政府给阿拉伯人的承诺相悖，成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的依据，并造成犹太复国主义者与阿拉伯人的纠纷和仇恨。——译者注

② R. Meinertzhagen, *Middle East Diary, 1917 - 1956*, London, 1959, pp. 29 - 30.

③ J. Wilson, *Lawrence of Arabia*, London, 1989, pp. 442 - 445. 《时代》杂志1976年2月28日的一篇报道声称这封信是事隔多年后才被发现的。劳伦斯本来把信寄给克莱顿，希望他转交赛克斯，但威尔森认为克莱顿决定不予转交。《时代》的报道称这封信后来为亚伯拉罕·罗森塔尔（Abraham Rosenthal）所有，但并未说明这封信如何到了他手里。——作者注

资助的阿拉伯叙利亚国,来削弱法国在叙利亚的影响。<sup>①</sup> 他仍表现出对《贝尔福宣言》的不确定:1919年他谈到英国对锡安主义者的承诺是轻率的、鲁莽的,因为它损害了英国与阿拉伯人的联盟。<sup>②</sup> 尽管有这样的疑虑,劳伦斯却主动说服费萨尔和他的父亲,犹太人定居有利于阿拉伯人,而且在给赛克斯的信之后,又写信给阿拉伯办事处的情报局长吉尔伯特·克莱顿(Gilbert Clayton)上校,表达了同样的想法。著名的牛津大学学者大卫·乔治·霍加斯(D. G. Hogarth)在牛津和在阿拉伯办事处时,都曾经影响劳伦斯。霍加斯认为锡安主义者对阿拉伯人的经济资助,会缓和他们因《贝尔福宣言》对英国态度的顾虑。他也使劳伦斯和克莱顿相信了这一点。克莱顿催促劳伦斯让费萨尔明白“与犹太复国主义者签订友好协约”<sup>③</sup>的重要性,劳伦斯告诉他“我会跟他讲,至少在战争期间,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的态度都会是相互谅解的。但也要记住他在他父亲(侯赛因国王)之下,不能独自决定阿拉伯王国事务。如果我们得到马德巴(Madaba),他就会去耶路撒冷,并且受到耶路撒冷犹太人的友好对待。那样也许就是你们想要的,但我不能做出公开承诺,因为那是我职责之外的。”<sup>④</sup>

劳伦斯的确并不完全认可《贝尔福宣言》,他的态度也因此受到影响。他不喜欢东欧和德国的犹太人,说他们很难相处,是傲慢、狡猾和无知的投机者;但他喜欢西欧和美国的犹太人,因为他们“心胸开阔又开明”<sup>⑤</sup>。有人推测他把魏茨曼归为后者。这并非劳伦斯反犹太主义的唯一迹象。巴勒斯坦犹太移民亚伦·阿伦森(Aaron Aaronsohn)领导了一个反土耳其信息网(NILI组织),他曾给劳伦斯提供信息。阿伦森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听劳伦斯讲话就如同参加一个有学问的、说英语的反犹太主义的普鲁士人的讲座。<sup>⑥</sup> 他的结论是劳伦斯对在巴勒斯坦定居的犹太人是充满敌意的。

① Knightley and C. Simpson, *The Secret Lives of Lawrence of Arabia*, London, 1969, p. 108.

② L. James, *The Golden Warrior*, London, 1990, p. 232.

③ A. L. Tibawi, "T. E. Lawrence, Feisal and Weizmann: The 1919 attempt to secure an Arab Balfour Declaration," in *Royal Central Asian Journal* VI (2), 1969, p. 157.

④ Public Records Office, Kew, Document FO882/7.

⑤ L. James, *The Golden Warrior*, London, 1990, p. 232.

⑥ A. Verrier ed., *Agents of Empire*, London, 1995, p. 289. 这本书的第三部分包含了阿伦森从1916年11月至1919年1月的日记。

然而，也有人指责劳伦斯过于热心说服费萨尔和锡安主义者达成协议，<sup>①</sup>正是他对费萨尔的影响促成了1918年6月费萨尔和魏茨曼在亚喀巴（Aqaba）的会面。对于中东局势，劳伦斯有他自己的计划，在他的设想中，锡安主义者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劳伦斯，连同另外几位英国外交家，如马克·赛克斯，威廉·奥姆斯比-戈尔（William Ormsby-Gore）都认为锡安主义者和阿拉伯的利益可以联合起来，从而给中东带来政治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sup>②</sup>英国政府急于与费萨尔和解，这样一来，巴勒斯坦和它北部的邻国叙利亚就会处于英国的影响之下。<sup>③</sup>对于这一点，劳伦斯是完全支持的。费萨尔和魏茨曼讨论了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合作的必要性。据魏茨曼说，费萨尔欢迎犹太人协助他挺近大马士革，并在国际上给予他政治协助的建议。劳伦斯是两人谈话的中间人和翻译官。在劳伦斯的帮助和鼓励下，魏茨曼提出了一些锡安主义运动资助阿拉伯王国巩固其统治的切实可行的建议。而阿拉伯人对此的回报，便是完全认可锡安主义在巴勒斯坦的要求。<sup>④</sup>

1918年10月29日，劳伦斯在战时内阁东方委员会发表讲话，说费萨尔会选择自己的顾问，但是如果他（费萨尔）对叙利亚的统治被认可，同时由英国管理巴勒斯坦，他会选择英国和美国的锡安主义犹太人为顾问。<sup>⑤</sup>在给战时内阁的汇报中，劳伦斯认为阿拉伯人虽然不赞成建立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独立，但他们支持英国而其他国家的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如果有人试图按照《赛克斯-皮科协定》建立所谓国际化管理，费萨尔将要求巴勒斯坦自治，并代表阿拉伯政府从道义上支持巴勒斯坦农民反抗征地。<sup>⑥</sup>迈纳茨哈根建议魏茨曼全力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而费萨尔一定是改变了立场，因为劳伦斯说他（费萨尔）会支持犹太人建国。<sup>⑦</sup>在巴黎和会上，劳伦斯说服了英国外交大臣亚瑟·贝尔福，双方达成了共识：虽然机

① G. Antonius, *The Arab Awakening*, Beirut, 1969, p. 284.

② J. E. Mack, *A Prince of Our Disorder*, Boston and Toronto, 1976, p. 261.

③ G. Antonius, *The Arab Awakening*, Beirut, 1969, pp. 282 - 283.

④ D. Barzilay and B. Litvinoff eds., *The Letters and Papers of Chaim Weizmann VIII*, Jerusalem, 1977, p. 207.

⑤ Public Records Office, Kew, Document, CAB 27/24.

⑥ D. Garnett ed., *The Letters of T. E. Lawrence*, London, 1938, p. 269.

⑦ R. Meinertzhagen, *Middle East Diary, 1917 - 1956*, London, 1959, p. 15.

率很小,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可以合作建立“近东天堂的实体框架”。<sup>①</sup>

费萨尔和魏茨曼被安排进一步会谈,通过1918年12月和1919年1月的两次会议,双方达成了《魏茨曼—费萨尔协定》(*Weizmann-Feisal Agreement*)。此事的辅助人员除了劳伦斯,还有努里·萨伊德(Nuri Said)、鲁斯图姆·海德尔(Rustum Haidar)和奥尼·阿卜杜拉-哈迪(Auni Abdul-Hadi),<sup>②</sup>这几位均是之后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中非常重要的人物。据魏茨曼所言,劳伦斯充当了会谈的中间人,参与了协商,辅助协定草案的撰写,<sup>③</sup>通过协定达成了二者的完全谅解。<sup>④</sup>协定中关键的一点是“尽一切可能鼓励和激励犹太人大规模向巴勒斯坦移民,同时尽快通过就近安置和集约耕种使移民定居。”阿拉伯农民和佃农的权利将得到保护,锡安主义组织同意“派专家团到巴勒斯坦进行经济发展状况的调查并提交最佳发展方案”。不过,费萨尔的确加了一条重要的附带条件(随后引起了很大争议):如果英国违背了关于阿拉伯独立的诺言,他也不会遵守协议中的“任何一个字”。<sup>⑤</sup>在这一系列的协商过程中,劳伦斯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他使费萨尔相信犹太人的资金和处理中东问题的技巧具有潜在价值。总的来说,费萨尔是尊重犹太人的,因为在这两次会面之初,他向魏茨曼谈及他不能理解在其他国家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可以一起生活,没有任何冲突,而到了巴勒斯坦两者就会有摩擦。<sup>⑥</sup>

事实上,费萨尔在接受路透社的采访时,做出了比《魏茨曼—费萨尔协定》更正面、更进一步的声明。

闪米特族主要的两个分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他们理解彼此。我希望通过在和会上交流意见,两个民族都能在民族自决理想的指导下,在全国范围内,推动自己的愿望取得一定的进展。阿拉伯人并不嫉妒锡安主义犹太人,也打算与他们公平竞争,锡安主义犹太人也向阿拉伯民族主义

① J. E. Villars, *T. E. Lawrence or the Search for the Absolute*, London, 1958, p. 259.

② M. Perlman, "Chapters of Arab-Jewish Diplomacy," in *Jewish Social Studies* VI (2), 1944, p. 141.

③ *Palestine Royal Commission*, Comand Paper 5479, Colonial No. 134. Minutes of Evidence Heard at Public Session, London, 1937, p. 37. 证据提交时间为1936年11月25日。

④ C. Weizmann, *Trial and Error*, London, 1949, p. 294.

⑤ G. Antonius, *The Arab Awakening*, Beirut, 1969, pp. 438 - 439.

⑥ J. Wilson, *Lawrence of Arabia*, London, 1989, p. 593.

者保证他们愿意看到在各自的领域公平竞争。土耳其人的阴谋使得犹太移民和当地农民之间产生了嫌隙，但真正理解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意图后，之前的怨恨就一笔勾销了。事实上，因为阿拉伯秘密革命委员会（Arab Secret-Revolutionary Committee）的工作，这种怨恨在战争之前几乎已经消失了。在过去两年里，革命委员会为阿拉伯军队在叙利亚及其他地区的胜利奠定了基础。<sup>①</sup>

毋庸置疑，劳伦斯起草了协定。

与魏茨曼达成一致后不久，劳伦斯又陪同费萨尔参加了与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的会谈，后者是参加巴黎和会的美国锡安主义代表团团长。美国锡安主义者非常希望与参会的阿拉伯领导人直接联系，费萨尔和弗兰克福特之间也达成了协议。费萨尔告诉弗兰克福特不能因为恢复犹太文明而牺牲阿拉伯人民和他们的文化，但他认可《贝尔福宣言》的目标。两人一致同意通过信件来厘清彼此的观点，费萨尔给弗兰克福特的信很快便刊登在1919年3月5日的《纽约时报》上。信上是这样说的：

我想通过这个机会使美国锡安主义者相信我在阿拉伯半岛和欧洲经常给魏茨曼博士所说的，我们认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种族上是堂兄弟，在比他们更强大的国家的统治下遭受过同样的压迫，可喜的是，碰巧又要一起开始完成建国的理想。

我们阿拉伯人对锡安运动怀着最深切的同情。我们在巴黎的代表团已经完全知晓锡安主义者递交给巴黎和会的提案，并认为那是温和的、适当的。我们会尽力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也衷心欢迎犹太人回家……犹太运动是民族主义的而非帝国主义的……叙利亚会容纳我们两者。事实上我认为没有另一方的帮助没有人可以真正成功。

那些不如我们双方领导人那样了解情况的或是那么负责任的人，忽视了阿拉伯人和锡安主义者合作的必要性，试图利用我们在运动初期在巴勒斯坦必然产生的差异。恐怕有些人给阿拉伯农民误传了你们的意图，也给犹太农民歪曲了我们的目标。结果，相关的利益集团能够从我们所谓的分歧中获得政治资本。我希望你们相信我坚定的信

---

<sup>①</sup> *The Times*, 12 December 1918, p. 7.

念, 这些差异绝非原则问题, 只是细节问题……可以基于我们彼此的友善而调整……我的人民期待未来我们可以互相帮助。<sup>①</sup>

信中所表达的观点比在路透社发表的声明更进一步表明了费萨尔这一时期的立场。但此后, 这封信和《魏茨曼—费萨尔协定》都引起了一些争议, 并被认为是缺乏真实性的。费萨尔给法兰克福特的信自发表以来从未被质疑过, 十年后, 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声称那是伪造的, 是劳伦斯在费萨尔不知情的情况下寄给法兰克福特的。<sup>②</sup> 1929年, 在调查巴勒斯坦骚乱的肖恩委员会(Shaw Commission)的听证会上, 锡安主义者的辩护人博伊德·贝里曼爵士(Boyd Berriman)出示了这封信的副本, 以证明1919年费萨尔对锡安主义的亲善。一位阿拉伯政府官员反驳道: 费萨尔“永远也写不出这样的一封信”。<sup>③</sup> 调查进行期间, 阿拉伯代表团给在巴格达的费萨尔国王发了封电报写道“据说……在给法兰克福特的信中, 您同意锡安主义的政策。请回电报纠正这个传闻。”<sup>④</sup> 当时费萨尔的首席政治秘书鲁斯图姆·海德尔的回复称, “据我所知, 国王陛下并不记得写过那样的东西”<sup>⑤</sup> (作为他故事结尾应该提一下: 海德尔于1940年被暗杀了<sup>⑥</sup>)。

对法兰克福特的信涉嫌伪造的指控是经不住检验的。这封信一公布就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费萨尔当时的意见与路透社的访谈没有什么不同。1919年整整一年, 费萨尔或是任何他的朋友都没有否认过这封信的存在。有趣的是, 1929年那封发给费萨尔的电报似乎暗示了这封信的存在。然而, 过了整整十年才出现了对其真实性的质疑声。法兰克福特说费萨尔的信可以作为影响巴勒斯坦阿拉伯—犹太人关系的基本文件, 同时说明了他和费萨尔的协商过程。法兰克福特说自己与费萨尔的会面在巴黎布洛涅森林费萨

① *New York Times*, 5 March 1919, p. 7.

② S. Mousa, *T. E. Lawrence: An Arab View*, London, New York and Toronto, 1966, pp. 229–230.

③ *Minutes of Evidence of Commission on Disturbances in Palestine in 1929*, Colonial No. 48, London, 1929. 证据提交日期为1929年11月30日。

④ *Minutes of Evidence of Commission on Disturbances in Palestine in 1929*, Colonial No. 48, Exhibit 125a.

⑤ *Minutes of Evidence of Commission on Disturbances in Palestine in 1929*, Colonial No. 48, Exhibit 125.

⑥ M. Perlman, “Chapters of Arab-Jewish Diplomacy,” in *Jewish Social Studies* VI (2), 1944, p. 141.

尔的别墅里，劳伦斯任翻译。他们交换了意见并且同意通信来阐述各自的观点，作为阿拉伯和犹太人的正式公开声明。双方同意由劳伦斯用英文撰写费萨尔观点的具体内容。弗兰克福特随即与劳伦斯回到旅馆，两人各自写了一封信。劳伦斯把他的那封交由费萨尔签字并寄给弗兰克福特。<sup>①</sup>当然，劳伦斯有可能在费萨尔想表达的意思中加入了一些他自己的话。事实是1918年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期，费萨尔在很多场合表现出同情锡安主义的倾向。安东尼厄斯（Antonius）认为费萨尔承受着来自劳伦斯和英国外交部的巨大压力，但是他承认费萨尔最终认可在巴勒斯坦与犹太人合作是可行的。<sup>②</sup>

1959年，迈纳茨哈根的著作给这件事打开了新局面。在著作中，迈纳茨哈根声称这封信是费萨尔和魏茨曼、劳伦斯、弗兰克福特还有他本人共同起草的。<sup>③</sup>魏茨曼在他的自传中引用了这封信，认为这封信非同一般。他说信中表达了费萨尔的观点，消除了有些人对锡安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制定自己的行动，丝毫不考虑“阿拉伯世界的愿望和福祉”的批评。<sup>④</sup>然而，他并没有提到当时写这封信的环境。当有人在肖恩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质疑这封信的真实性时，迈纳茨哈根并未做出回应，而且他的描述并没有任何资料为证，应该谨慎对待。

在《魏茨曼—费萨尔协定》公布之日，阿拉伯方面相关人士也声称该协定并不代表费萨尔的观点。1936年开始有传言，提及建立犹太国家的承诺与给阿拉伯人的承诺并不一致，而且费萨尔并没有与魏茨曼达成协定。据说是劳伦斯误译了阿拉伯版本的费萨尔的声明，即履行他的义务必须以英国政府实现阿拉伯人的要求为前提，而这一点被劳伦斯有意淡化了。受这些指控的刺激，魏茨曼在《时代》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这个被他称为“友谊之约”的协定，由劳伦斯亲手写下费萨尔声明的英文翻译，而且费萨尔也签了字。<sup>⑤</sup>魏茨曼声称自己保留着当时书写该声明的纸本。他的声明在众议院受到了质疑，但是殖民大臣威廉姆·奥姆斯比—戈尔支持他的说法，

① *Atlantic Monthly*, October 1930, p. 50.

② G. Antonius, *The Arab Awakening*, Beirut, 1969, pp. 284 - 285.

③ R. Meinertzhagen, *Middle East Diary, 1917 - 1956*, London, 1959, p. 15.

④ C. Weizmann, *Trial and Error*, London, 1949, pp. 307 - 308.

⑤ *The Times*, 10 June 1936, p. 15.

因为他跟劳伦斯非常熟，也认出了那张纸条上是劳伦斯的笔迹。<sup>①</sup>在这次辩论中，工党反对派发言人赫伯特·莫里森（Herbert Morrison）提到此协定，也认为“埃米尔费萨尔已经代表阿拉伯人民接受了这个协定”。<sup>②</sup>

巴勒斯坦历史学家提巴威（Tibawi）试图对弗兰克福特和《魏茨曼—费萨尔协定》的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他声称魏茨曼和费萨尔会谈时（他并未明确哪次会议），带着用英语撰写的、已经打印出来的协定，费萨尔对协定的条款的理解完全依赖劳伦斯。<sup>③</sup>以此表明此声明正是费萨尔之前阿拉伯语的声明，只是劳伦斯没有正确地翻译成英语，但是很显然他所提供的两个版本并无重大区别。然而，提巴威也承认费萨尔准备好了在阿拉伯人统治的前提下，接受锡安主义计划。至于弗兰克福特的信，提巴威检查了1964年11月发表于《耶路撒冷邮报》的副本，结论是费萨尔的签名是伪造的，因为这几个阿拉伯字母写得“笨拙又不确定”。他还因为写信的纸似乎是“特别准备的信纸”而质疑这封信的真实性。<sup>④</sup>

曾任英国国会议员，向阿拉伯致歉者的主要成员之一安东尼·纳丁（Anthony Nutting）也写过弗兰克福特的信件问题。他并不认为这封信是伪造的，但是他说“那些宽宏大量的词句听起来更像劳伦斯而不是费萨尔所说”。<sup>⑤</sup>在诸多的争议中，即便这封信是伪造的，那会更加明确劳伦斯对锡安主义的同情。费萨尔也曾发表过别的评论显示他的立场，而且可以与路透和弗兰克福特的声明互补。其中之一便是在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为他（费萨尔）举办的一次晚宴上（在他寄出弗兰克福特信件的两个月前），他说“阿拉伯与犹太人关系最近了，即使欧洲国家没有如期望中对待他们，从巴格达到也门和科多瓦，他们也一直是亲密的朋友。没有一个真正的阿拉伯人会怀疑犹太民族主义。”他肯定地说没有犹太人要把他的清真寺变成一座教堂，“如果我们不欢迎（犹太人）……回家并尽阿拉伯国家所能与他们合作，我们会显得很卑劣。魏茨曼博士的理想就是我们的理

① *Hansard Parliamentary Debates* 5th Series, House of Commons CCCXIII (1935-1936), column 1393, 19 June 1936.

② *Hansard Parliamentary Debates* 5th Series, column 1382.

③ Tibawi, pp. 159-162.

④ A. L. Tibawi, *Anglo-Arab Relations and 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 1914-1921*, London, 1977, p. 349.

⑤ A. Nutting, *Lawrence of Arabia*, New York, 1962, p. 182.

想……（我们）是有血缘关系的兄弟”。<sup>①</sup>奇怪的是，比起弗兰克福特的信，路透社的声明和这段讲话都没有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

当费萨尔回去主政，劳伦斯和他的联系不那么紧密时，费萨尔的立场的确产生了些许改变。1919年末，在接受伦敦《犹太纪事》（*Jewish Chronicle*）记者的采访时，他极力强调巴勒斯坦是阿拉伯的圣地，是叙利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说犹太人在那里定居必须“服从目前这片土地拥有者的权利、理想和感情”。<sup>②</sup>他依然赞成魏茨曼的提议，认为那个提议温和而实际，他也很高兴看到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定居并享有同等权利。他们敦促犹太人来到巴勒斯坦，特别是当他们“有钱而我们有人”。这次采访一定是引起了犹太社区的疑虑，为此两个月后费萨尔写信给赫伯特·塞缪尔（Herbert Samuel）以驱除这些疑虑。他从巴黎写信告诉塞缪尔，他很高兴塞缪尔选择在《贝尔福宣言》发表两周年时，来消除因为《犹太纪事》的采访而引起的误解。他写道“我完全相信我和魏茨曼博士之间的相互理解是坚定的，我们建立的相互信任和完全一致的观点，会防止未来类似的误解，也会保持我们之间的和谐，以保证我们共同的事业的成功。”<sup>③</sup>1936年，为了澄清他与费萨尔之间协议的争论，魏茨曼给《时代》杂志提交了这封信的文本，以确认费萨尔已和他达成协议。<sup>④</sup>对费萨尔的采访中有件事特别有趣，他似乎认为每年会有相对少数的犹太人（1000~1500名）会在巴勒斯坦定居，意味着他的亲锡安主义倾向是建立在犹太移民数量较少的前提下的。关于劳伦斯的记录中没有迹象表明他对犹太定居人数持同样的观点。众所周知，他实际上担忧这个国家犹太人的安全。1921年，在巴勒斯坦表示不会组织国防军的决定之后，劳伦斯表达了他对于安全问题的担心，并为战时内阁中东委员会做了备忘录“我认为目前犹太人殖民地防御不足……英国军队不会像保护自己一样保护他们……不久，可能会发生普遍的（阿拉伯）反对殖民主义的起义……锡安主义的最终胜利会结束它（犹太人的防御问题），但这可能是50年以后的事了。”他建议应该给予这些移

① *Jewish Chronicle*, 3 January 1919, p. 20.

② *Jewish Chronicle*, 3 October 1919, pp. 14-15.

③ *The Times*, 19 June 1936, p. 12.

④ *The Times*, 19 June 1936, p. 12.

民防御手段,直到英国军队介入。<sup>①</sup>另外还有一件事令劳伦斯对犹太人的自身安全感到不安。他陪同丘吉尔和特使塞缪尔经过加沙,受到民众欢迎,他们欢呼“欢迎殖民大臣,大不列颠万岁!”但是他们也疯狂地呼喊“打倒犹太人。割断他们的咽喉!”丘吉尔和塞缪尔都不懂阿拉伯语,对自己受到的接待很欢喜,但劳伦斯非常明确地听到民众的呐喊,而且“明显对整个局势非常担心”<sup>②</sup>。

当劳合·乔治说服他的内阁和法国人,英国应该有权托管巴勒斯坦,劳伦斯的思想确实出现了矛盾。1919年,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英国的委任统治将意味着锡安主义将在耶路撒冷拥有中心,并补充道“他们会为整个东部提供资金支持……像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高贵的犹太人不愿把太多资金投入巴勒斯坦,因为那个国家除了情感寄托,回馈不了什么。他们希望6%的回报。”<sup>③</sup>但大概同一时间,他与其他几个殖民顾问一起告诉丘吉尔,约旦河以西巴勒斯坦的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原因是英国正式托管该地区后,迟迟不准许犹太实业家继续他们的工业发展计划。<sup>④</sup>

劳伦斯对魏茨曼非常仰慕,他写给耶路撒冷主教的信是其中一个证据。对魏茨曼而言,别人尊重他、向他吐露秘密,他当然会领情。例如,有一次劳伦斯告诉魏茨曼,有人煽动反对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利益,<sup>⑤</sup>如果他敌视锡安主义的话是不会说这些话的。魏茨曼相信劳伦斯本人很满意阿拉伯人主张的合法化,<sup>⑥</sup>但是他对劳伦斯本人的看法还是有所保留。他曾经在给妻子薇拉(Vera)的信中说劳伦斯“并不是很好”,<sup>⑦</sup>还有一次是在劳伦斯在丘吉尔的殖民办公室任职期间,魏茨曼告诉妻子,“我不怎么信任劳伦斯”。<sup>⑧</sup>

为纪念劳伦斯而出版的《朋友们眼中的劳伦斯》(*Lawrence by His Friends*),包含了大量表达对其致敬和欣赏之词。魏茨曼写道1918年6月在亚喀巴见

① D. Ingrams ed., *Palestine Papers 1917-22: Seeds of Conflict*, London, 1972, p. 127.

② A. W. Lawrence ed., *Lawrence by His Friends*, London, 1937, pp. 235-236.

③ M. Gilbert, *Exile and Return*, Philadelphia and New York, 1978, p. 123.

④ M. Gilbert, *Winston S. Churchill IV 1916-1922*, London, 1975, pp. 538-539.

⑤ J. Reinharz ed., *The Letters and Papers of Chaim Weizmann*, Jerusalem, 1977, p. 9, 130.

⑥ N. A. Rose ed., *The Letters and Papers of Chaim Weizmann*, Jerusalem, 1979, p. 19, 131-132.

⑦ B. Wasserstein ed., *The Letters and Papers of Chaim Weizmann*, Jerusalem, 1977, p. 10, 153.

⑧ B. Wasserstein ed., p. 10, 157.

到劳伦斯之前，正是计划攻打土耳其铁路的时候，他担心劳伦斯会敌视锡安主义者，“当我发现他不仅对锡安主义的理想很友好，而且完全了解我们的主旨，我真的松了一口气”。他补充说劳伦斯从不认为建立犹太民族家园的政策与给阿拉伯人的担保之间存在任何的矛盾，他也不认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目标和愿望与阿拉伯人的利益相冲突。魏茨曼承认劳伦斯对锡安主义的可行性有些怀疑，但是当1920年哈鲁兹（Halutzim）（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先驱）从东欧来到巴勒斯坦，他就被他们的情感和勤劳所感动。1921年，两人的长谈使他确信劳伦斯认可犹太人—阿拉伯人合作的重要性。劳伦斯认为“阿拉伯人的救赎有可能通过犹太人的救赎来实现”，两个民族的紧密合作会带来双方的共同利益。<sup>①</sup> 1946年，魏茨曼在写给英国首相克莱门特·阿特利（Clement Attlee）的信中表扬了劳伦斯，认为他是阿拉伯领导人中最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定居的人之一。<sup>②</sup>

劳伦斯关于锡安主义和阿拉伯—犹太人合作的多数观点都与费萨尔一致，但也有很多其他的例子表明他个人对锡安主义的肯定态度。远在卷入中东政治之前，他就显示出对巴勒斯坦犹太移民的同情。1909年他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巴勒斯坦很好，容易改造，“犹太人越早去开垦越好，他们的聚居区会是沙漠中的辉煌所在”。<sup>③</sup> 在他加入阿拉伯办事处之前他就记录自己在巴勒斯坦的战前调研。他所指的“巴勒斯坦土著犹太人”成功地在这些土地上耕作，因而享受着比他们的阿拉伯邻居们更好的生活。据说这些犹太人“并不显露自己的才能”，但是他瞧不起哈西德（Haredi）（极端正统派）派犹太人，认为他们“无法容忍任何非本民族的人靠近”；他们以巴勒斯坦农民为敌，并认为他们“比叙利亚北部的农民更愚蠢，更物质至上而且是破产的”。他补充道，那些可以自己偿清债务的犹太移民是“坦诚他们对于殖民扩张的意图，理应受到尊重”。<sup>④</sup> 另一个他倾向锡安主义的情感表现在1921年阿卜杜拉进军安曼。丘吉尔很担心从外约旦兴起反犹运动，并且非常想扼制这种局面。对此，劳伦斯也持同样观点。劳伦斯认为阿卜杜拉并没有很强的领导力，他需要英国政府的支持来保留自己的统治，所

① A. W. Lawrence ed. , *Lawrence by His Friends* , London , 1937 , pp. 220 – 224.

② J. Heller ed. , *The Letters and Papers of Chaim Weizmann* , Jerusalem , 1977 , p. 22 , 124.

③ D. Garnett ed. , *The Letters of T. E. Lawrence* , London , 1938 , p. 74.

④ M. Brown ed. , *Secret Despatches from Arabia and Other Writings* , London , 1991 , pp. 103 – 104.

以他提出让阿卜杜拉成为外约旦的统治者，可以使英国政府有能力制止任何他周密考虑的反犹活动。他告诉丘吉尔“四到五年后，在公正的政策影响下，锡安主义的反对力量就会减少甚至完全消失”。通过指定一个可以施加压力，使其制止反犹运动的统治者，使外约旦成为一个安全阀是更可取的方式，锡安主义的反对势力最终可能会消失。<sup>①</sup> 威廉·耶鲁（William Yale），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派往中东的金—克兰调查团（King—Crane Commission）成员，支持劳伦斯对锡安主义情况的理解，而且认为锡安主义是可以与阿拉伯人的理想共存的。耶鲁赞成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并建议允许继续进行锡安主义对这个国家的计划，他得到了劳伦斯以及努里·赛义德和鲁斯图姆·海德尔的支持，后两位称费萨尔会接受这些计划。耶鲁记录道：劳伦斯“看完我设计的解决方案，极为赞成，说这个计划给了阿拉伯人比他本人敢给他们保证的还要多”。<sup>②</sup>

赫伯特的儿子埃德温·塞缪尔（Edwin Samuel）在委任统治政府任职近30年，之后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任教。20世纪30年代，塞缪尔采访了在英国皇家空军服役的劳伦斯，并提出了“为什么他被有些人称为反锡安主义者”的问题。劳伦斯回答说那是无稽之谈，他发明的口号是“阿拉伯给阿拉伯人，犹太给犹太人，亚美尼亚给亚美尼亚人”。塞缪尔写道劳伦斯并非支持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的任何要求。<sup>③</sup> 有一次劳伦斯告诉劳埃德·乔治，巴勒斯坦应该是英国和犹太人创建家园的地方。<sup>④</sup> 劳伦斯这一观点的另一个支撑是在《贝尔福宣言》一周年的纪念会中，他给一家犹太报纸所做的声明“我不是犹太人，但我果断地支持锡安主义；事实上，我把犹太人看作西方影响的天然输入者，这种影响对近东的国家非常有必要。”<sup>⑤</sup> 英国的锡安主义组织也为劳伦斯同情锡安主义的说法提供了支持。为纪念劳伦斯诞生一百周年，他们公开发行了宣传册，旨在反对他反锡安主义的说法，其中包含魏茨曼多年前所写的评语。著名历史学家、坚定的锡安主义者刘易斯·纳梅尔（Lewis Namier），也提供了劳伦斯亲锡安主义的线索。1930

① M. Gilbert, *Winston S. Churchill IV 1916 - 1922*, London, 1975, p. 553.

② A. W. Lawrence ed., *Lawrence by His Friends*, London, 1937, pp. 285 - 286.

③ E. Samuel, *A Lifetime in Jerusalem*, London, 1970, p. 48.

④ R. Aldington, *Lawrence of Arabia*, London, 1955, p. 259.

⑤ M. Gilbert, *Exile and Return*, Philadelphia and New York, 1978, p. 115.

年，在与纳梅尔的一次对话中，劳伦斯告诉他“锡安主义的问题是第三代人的问题。成败将掌握在你们这些移民的子孙手中。但是成功几率很高，这个试验也值得支持，我支持它不是因为犹太人，而是因为一个有活力的巴勒斯坦将提高整个中东邻国的地位。”纳米尔补充说他简短记录了这些话，并且给劳伦斯复述了一遍，他还向殖民大臣马科姆·麦克唐纳（Malcolm MacDonald）捎去了劳伦斯的口信，说他准备好了在英国内阁为锡安主义者做证词，但这件事看起来并没有付诸实施。<sup>①</sup>

最后一个相关证据是题为《劳伦斯在巴勒斯坦》（*Lawrence on Palestine*）的小册子。这本册子由伦敦的英国与巴勒斯坦俱乐部发行，该俱乐部组织无党派的犹太人论坛，讨论锡安主义与巴勒斯坦相关问题，这表明劳伦斯被认为是锡安主义的同情者。册子开篇就指出“阿拉伯的劳伦斯可能是阿拉伯人有史以来所能拥有的最好的英国朋友了。他了解他们，理解他们，他知道英国人给他们承诺了什么。非常有趣的是，目前我们知道，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他是完全支持锡安主义的。”这个册子引用了一封劳伦斯写给罗伯特·格拉费斯（Robert Graves）的信。格拉费斯是位诗人、小说家，还曾经在开罗大学教授英语课程。信中他向格拉费斯保证锡安主义的成功会“大大加强阿拉伯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物质进步”<sup>②</sup>。

至于1920年9月，劳伦斯自己在一篇发表在《圆桌》（*The Round Table*）杂志上却未署名的《变化中的东方》（*The Changing East*）的文章中，坚称犹太人移民可以使阿拉伯人受益。他写道：“（犹太人的试验）是有意识的，代表欧洲的少数族群，迎头挑战时代的潮流，再一次回到东方，他们来的地方……他们打算在目前都讲阿拉伯语的人中间定居，这些与他们同宗同源的人，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社会状况。他们希望调整生活方式以适应巴勒斯坦的气候，并且通过他们的技术和资本使这一地区像欧洲国家一样高度组织化。他们计划的成功将不可避免地将目前阿拉伯人提高到他们自己的物质水平，时间上仅在他们之后不久，结果可能对阿拉伯世界的未来极其重要……”他继续写道“未来阿拉伯经济和技术的成败很大程度上

① L. B. Namier, *In the Margin of History*, London, 1939, pp. 281 - 282.

② Library Publications Committee, Anglo-Palestine Club, *Lawrence on Palestine* (London n. d.).

取决于锡安主义者的努力和俄罗斯事件<sup>①</sup>的进程。”<sup>②</sup> 这篇文章澄清了劳伦斯对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定居的(至少在1920年)立场,但重要的是,他要确保自己的作者身份不被透露。在劳伦斯去世四年后,这篇文章在其作品集《东方集锦》(*Oriental Assembly*)中才被披露。

### 三 对劳伦斯的评价: 充满争议的锡安主义者

劳伦斯去世的前几年,阿拉伯评论家们对他充满赞扬。他被认为是一个伟大的人,为了推进阿拉伯事业,努力而勇敢的奋斗,他赢得了很多人的尊敬。费萨尔成为伊拉克国王后写给劳伦斯的未发表的信中(复印件现保存在大英博物馆)也充满了热情和想念,费萨尔对劳伦斯的感情并没有因为他不再担任自己的顾问而有所改变。<sup>③</sup> 还有一封发表于1932年11月的信件,费萨尔表示“诚恳感谢你对我们事业的兴趣,即使你与我们相隔万里”。他赞扬劳伦斯是“真诚的朋友……一直是我们的支持者”。<sup>④</sup> 费萨尔国王也曾暗示,希望在第二年访问伦敦时再见到劳伦斯。但是,梅纳茨哈根写道费萨尔1922年11月曾告诉他,自己已经不再信任劳伦斯了;说劳伦斯是“骗子”、冒险家和自吹自擂的家伙。<sup>⑤</sup> 梅纳茨哈根的确又提到费萨尔这样批评一个为他做了那么多事的人是非常无礼的,但是我们要小心看待这些评论,因为这些是梅纳茨哈根过了很久之后写出来的。毫无疑问,劳伦斯对费萨尔非常尊敬,他认为费萨尔是“最民主的人”,是“萨拉丁之后最伟大的阿拉伯领袖”。他也指出当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请求费萨尔支持和帮助他们对抗犹太人时,费萨尔告诉他们“锡安主义并不是不能与阿拉伯人的愿望相互包容”。<sup>⑥</sup>

劳伦斯去世后,伦敦的伊拉克事务管理处称赞他为“阿拉伯和平的捍卫者,为了我们国家的独立而努力奋斗”。他们认为劳伦斯在一战和会谈期

① 这里指1917年俄国革命后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影响。——译者注

② “The Changing East,” in *The Round Table*, September 1920, p. 769. 这篇文章初次发表时并未署名,再次发表时署名劳伦斯。

③ Mach (See n. 26), p. 501.

④ A. W. Lawrence ed., *Letters to T. E. Lawrence*, London, 1962, pp. 56-57.

⑤ R. Meinertzhagen, *Middle East Diary, 1917-1956*, London, 1959, p. 35.

⑥ *The Times*, 11 August 1920, p. 9.

间促进了阿拉伯事业，所以“阿拉伯国家会沉痛哀悼他的离世，因为他们失去了一个伟大的朋友”。沙特阿拉伯在伦敦的发言人说他因为勇气和战斗才能被人尊敬。费尔德-马歇尔·艾伦比（Feild-Marshall Allenby）说劳伦斯是阿拉伯运动的主要推动力，与其阿拉伯同伴（即费萨尔）完全一致。历史学家巴西尔·利德尔-哈特（Basil Liddell-Hart）认为劳伦斯出色地完成了他的目标，给予阿拉伯人公平实现梦想的机会。<sup>①</sup>

劳伦斯对阿拉伯人事业的付出是无须怀疑的。丘吉尔写道：1919 年被授予巴斯勋章后，劳伦斯在与乔治五世私下会面时，拒绝接受这一荣誉。他告诉国王他不会在英国“将要违背他以国家名义给勇敢战斗的阿拉伯人所做的承诺时，接受任何荣誉”。<sup>②</sup> 同年，他写信给劳合·乔治，感谢他没有让阿拉伯人失望，因为他之前以为他们会违背承诺。<sup>③</sup> 关于劳伦斯的死，纳粹官方新闻机构称赞他是一个非常忠于责任、毫不利己、自我牺牲的英雄，在英国的英雄人物中几乎是个神话。但是在四年的时间里，纳粹的宣传机器就改变了它的立场。一部名为《大马士革起义》（*Uprising in Damascus*）的影片把他塑造为“英国殖民主义和锡安主义阴险的代理人”。<sup>④</sup> 有一种说法是德国纳粹曾在 1932 年试图联系他，但他拒绝了他们的提议。就在劳伦斯离世前，英国作家、纳粹支持者亨利·威廉姆森（Henry Williamson）试图跟进这件事却没有成功，<sup>⑤</sup> 威廉姆森认为劳伦斯对希特勒丝毫没有同情。

自 1917 年后，阿拉伯世界对劳伦斯和他在中东事务中的角色的普遍态度改变了，许多阿拉伯评论家认为他是亲锡安主义的。著名的阿拉伯历史学家萨勒曼·穆萨（Suleiman Mousa）在其著作《劳伦斯：一个阿拉伯人的观点》（*T. E. Lawrence: An Arab View*）中，批判了那个时代劳伦斯在中东政治中的角色。<sup>⑥</sup> 奥尼·阿卜杜拉-哈迪曾经在伦敦和巴黎担任费萨尔的秘书，他写道“劳伦斯在帮助锡安主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因为他错误地喜好锡安主义，即使大家都说他与阿拉伯人联系紧密。他首先是个英国人，

① *The Times*, 20 May 1935, p. 15.

② A. W. Lawrence ed., *Lawrence by His Friends*, London, p. 193.

③ D. Garnett ed., *The Letters of T. E. Lawrence*, London, 1938, p. 287.

④ L. James, *The Golden Warrior*, London, 1990, p. 362.

⑤ E. Lonrooth, *Lawrence of Arabia*, (London n. d.), p. 93.

⑥ S. Mousa, *T. E. Lawrence: An Arab View*, London, New York and Toronto, 1966, p. 40.

而且永远为英国的利益服务。”哈迪声称费萨尔借劳伦斯的帮助打败土耳其人，但是劳伦斯利用阿拉伯人的帮助实现了自己的利益。他还谈到英国一位亲阿拉伯的女士在自己家中举行了会议，抗议本国政府亲锡安主义的政策，劳伦斯却拒绝参加。因为他不认为反锡安主义有利于英国的利益。他断言只有在那时费萨尔才完全认识到劳伦斯在阿拉伯—锡安主义者的问题上的真实立场。<sup>①</sup>但是费萨尔对劳伦斯失去信任的说法与上文所引费萨尔的书信有悖。另一位作家，阿卜杜—阿拉讽刺劳伦斯在民族主义运动中的角色是“参与其中”却“从不属于”阿拉伯，称其是“锡安主义对巴勒斯坦设计”的支持者。<sup>②</sup>提拔威试图证实费萨尔主要在劳伦斯的压力下才与锡安主义者交易，以证实阿拉伯人支持《贝尔福宣言》。在他发表于《皇家中亚日报》(*Royal Central Asian Journal*)的文章中，提拔威最后写道“徒劳的!赛克斯和劳伦斯试图威胁和哄骗阿拉伯人接受英国政府的锡安主义的努力是徒劳的!”<sup>③</sup>但这个结论明显与他之前文章的一部分冲突，在那部分中他引用了费萨尔写给他的兄弟、大马士革副手的扎伊德(Zaid)的一封电报：“你大马士革那些报纸上的反锡安主义的文章……请向(叙利亚军事总督)解释锡安主义委员会在巴黎帮助我们很多，我非常乐意接受他们的好意。”<sup>④</sup>在这封电报之后，又有两篇以费萨尔名义发表的反锡安主义的文章。提拔威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暗示费萨尔对电报并不知情，但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近期关于这一话题的评论来自作家迈克·雅德利(Michael Yardley)，他说在他为自己的书《重回聚光灯下》(*Backing into the Limelight*)做调研时，见到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发现他们对劳伦斯的态度“敌视又愤恨”。同时叙利亚的信息部长也告诉雅德利，劳伦斯已经被遗忘了，官方认为他只是“帝国主义的间谍”而已。<sup>⑤</sup>

在很多方面，劳伦斯都是引起强烈的不同意见和偏见的集合体。梅纳茨哈根宣称自己比任何人都了解劳伦斯，也认为很难对这个“复杂而有趣

① S. Mousa, *T. E. Lawrence: An Arab View*, London, New York and Toronto, 1966, pp. 226–230.

② U. F. Abd-Allah, *The Islamic Struggle in Syria*, Berkeley, 1983, p. 38.

③ Tibawi, p. 163.

④ Tibawi, p. 161.

⑤ M. Yardley, *Backing into the Limelight*, London, 1985, p. 13.

的人”做出定论。<sup>①</sup>当然劳伦斯对《贝尔福宣言》的态度是矛盾的，保留了一些他对锡安主义者中德国犹太人最尖锐的评价，认为他们是“这群人中最外来的，最不宽厚的”。值得一提且有趣的一点是利德尔－哈特所著劳伦斯的官方传记发表于1934年，<sup>②</sup>劳伦斯本人也参与了写作。劳伦斯给了利德尔－哈特很多信件、对话和问答的记录，<sup>③</sup>但自传中并未提到锡安主义，甚至没提到“犹太人”的字眼。那么这说明在阿拉伯和锡安主义的历史中，劳伦斯处于何种立场呢？

《犹太文物百科全书》( *Encyclopaedia Judaica* ) 关于劳伦斯的条目一开始写道“几十年以来劳伦斯都被认为是浪漫传奇人物，被认为是阿拉伯民族主义事业的捍卫者，他批评英国人背叛了他们的责任……然而，毫无疑问，劳伦斯看起来从来不反对锡安主义，他认为锡安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是相互补充的力量。”<sup>④</sup>这个说法的最后一句话可能精确总结了他在现代巴勒斯坦历史上的位置。他所为之奋斗的一切表明了他的信仰，他需要将巴勒斯坦人民带入现代世界，让他们建立自治政府。他看到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存在（但不是完全的犹太人自治）可以帮助实现这一目标，保证阿拉伯经济健康发展。他赞同犹太人在约旦河西岸定居，但是并未预料到犹太人定居不可避免地会与阿拉伯意识形态产生冲突。

劳伦斯对以色列的态度会是什么呢？他死于1935年，但是从1930年他告诉纳梅尔他准备在英国内阁支持锡安主义之后，就再也没有发表任何关于阿拉伯－锡安主义问题的言论。1945或1948年后劳伦斯的态度会是怎样，考虑这样的问题毫无意义，正如最终他和费萨尔之间的争议不可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结论。

[责任编辑：刘金虎]

① R. Meinertzhagen, *Middle East Diary, 1917 - 1956*, London, 1959, p. 27.

② B. H. Liddell-Hart, *T. E. Lawrence: In Arabia and After*, London, 1934.

③ T. E. Lawrence, *To His Biographer*, New York, 1938.

④ *Encyclopaedia Judaica*, Jerusalem, 1971, p. 10: 1488.

## Metternich and the Ottoman Reform Movement

*Miroslav Šedivý , translated by Li Ning , reviewed by Wang Sanyi*

**Abstract:** The goal of the paper is to illuminate Metternich's attitude towards possibilities of reform in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reasons for his interest and practical steps taken in this matter. The paper attempts to provide an accurate account of an important , but until now , entirely ignored , aspect of Metternich's diplomacy and offer further proof that Metternich was not the benighted reactionary depicted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historiography , but a conservative keenly aware that the conservative order could survive only if reformed so as to adapt it to the realities of a post-revolutionary age.

**Keywords:** Metternich , Ottoman Empire , Reform Movement , Austria

## Lawrence and Zionism

*Cecil Bloom , translated by Zhao Na*

**Abstract:** During the World War I , the British officer T. E. Lawrence joined the military activities of the Arab Revolt against their Turkish rulers and supported the Arab cause of independence following the defeat the Ottoman Empire. He had then integrated totally into the Arab society and thus been known as Lawrence of Arabia. Historians interpret Lawrence's role in the Middle East differently. This article is to analyze Lawrence's position in Arab-Zionist history through the correspondences , conference minutes and memoirs , etc. The author holds that Lawrence encouraged Jews' immigration into Palestine , took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the efforts that Jews had done in helping with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Palestine , meanwhile , he devoted himself to the peace talk between the Arabs and the Jews and supported the coexistence of both in Palestine , therefore , he is pro-Zionism.

**Keywords:** Lawrence , Arabs , Zionism , Arab-Israel Conflict